

博物馆的社会治理效能与提升策略研究

——成人教育的视角

路亚北¹ 王中² 杨赛¹¹

(1. 常州博物馆 江苏 常州 213022;

2. 常州开放大学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博物馆成人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居民多元学习需求、引导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虽然在助力社会治理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是，长期忽视教育的价值导向和助力作用，导致相关理论研究还不深入、政策建构还不完善、内涵提炼还不到位、理念宣传还不充分等问题。要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治理效能，还需要对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工作进行提档升级，从政策引领、场域拓展、项目设计和方式创新等方面精准施策、系统推进，才能更好地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和完善。

【关键词】博物馆 成人教育 社会治理 效能 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博物馆是成人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博物馆有丰富的实物教学资料，适合成人的学习特点；博物馆涉及许多专业，包含的知识面较宽，容易满足成年人综合学习的要求；对一定的专业来说，博物馆人才集中、有较好的设备，能为成人教育提供适宜的进修条件^[1]。博物馆成人教育是博物馆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提升成人综合素养的一种终身教育服务方式，也是博物馆教育理念提升、教育对象细分的一种发展形态。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博物馆成人教育的积极探索，其内涵日益丰富，由组织成人参观展览向有更多互动的主题活动转型，而且这些主题活动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挖掘也受到了关注。在博物馆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博物馆成人教育项目化、主题式的活动方式更为多元，如欧盟（EU）资助的“成人教育与博物馆计划”（Adult Education and Museum）、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V&A学院”的成年人课程等^[2]，博物馆成人教育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民生领域，扩大了博物馆服务的范围，同时也对博物馆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物馆成人教育的受众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年龄层次跨度大、教育背景多元、学习基础和学习兴趣存在差异。根据学习的目的和教育的特点，可以将博物馆成人教育的对象分为学生和社会人士（专业学习）、成人观众（家庭教育）、老年观众（兴趣学习）以及其他类型的观众（休闲体验）等四种类型。不同的类型需要博物馆实施不同的成人教育策略，但共同的特点是成人由于积累了一定

作者简介：路亚北（1971-），男，常州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教育。王中（1971-），男，常州开放大学副校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杨赛（1984-），女，常州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教育。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江苏省文物科研课题“基于社会治理建设的博物馆成人教育研究——以江苏为例”（2019SK16）阶段性成果

的生活经验和职业知识，自主学习的意愿强烈，往往就是学习行为、学习体验的“发起者”，因此，博物馆成人教育需要充分考虑成人学习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才能有效发挥自身在成人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治理、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博物馆界对成人教育尚认识不一，还无法引导居民深度参与，导致博物馆在成人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不高，根据“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的调查数据，83.6%的居民表示愿意更深入地参与公共文化，但其愿意接受的方式主要包括“做公共文化服务的志愿者”“为公共文化服务献策建言”和“对公共文化活动捐赠”等^[3]。上述调查反映了虽然公众参与意愿强烈，但是参与的理念、方式、领域还有较大的局限性，需要博物馆从更广泛的公共议题和行动出发，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与价值引领。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彰显智慧、创新举措，社会治理效能与提升需要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包括政府、组织、居民在内）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共同发挥理念和行动的引领作用^[4]。从这一角度看，博物馆需要从吸引居民参与博物馆的活动延伸到促进居民个体知识的生成与治理理念的提升，并因循这一路径作出实质性的、体系性的变革。因此，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应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根据社会治理的要求，有效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从史实展示与知识信息传播拓展到帮助居民在文化遗产中汲取治理的力量，培育成人了解社会治理、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能力，进而拓展博物馆在公共责任方面的作用和价值，这是当下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的进展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理论引领、政策支持和实践探索是支撑博物馆开展成人教育并助力社会治理的三个关键要素，是博物馆重新审视成人教育工作、形成新的发展策略的重要基础。

（一）理论引领

从新博物馆学视角看，当代博物馆的发展理念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革，比如：从聚焦场馆建设转向加强内涵建设，从注重知识生产兼顾价值引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博物馆文化在其出生证上已经写下了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使命备注^[5]。博物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源远流长，撰写经典之作《博物馆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useum*）的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在自选集《文化、治理与社会》（*Culture, Governance and Society*）中专门用三个章节对“博物馆与治理”作了深入探讨，认为18世纪关注审美趣味与社会治理之间关系的整体背景，是由1688年后重构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需要所规定的^[6]。本尼特的“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而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本尼特关注文化实践的运作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关注美学知识如何作为权力分配、转移、运作和生效^[7]。本尼特通过文化实践将治理理论延伸到博物馆领域，认为博物馆应当为文化实践者的公民平等享有，而不是文物保管的秘藏之地。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场域，博物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冰冷的墙体建筑，而是专业人员与普通民众实现知识分享、相伴学习的温暖的社会空间。因此，博物馆应当基于治理理念，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挖掘其中的教化元素与治理精神，成为将审美与治理充分融合的“知识生产者”^[8]。

新博物馆学的理论发展从聚焦藏品本身走向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信息，促使博物馆在成人教育领域形成新的服务生态。研究认为，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是总体发展趋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英美两国为代表，西方博物馆对于平等、多元、包容的理念与实践由来已久，并已逐渐渗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公共服务、运营管理、评估认证、职业规范等各个方面^[9]。博物馆的教化功能正逐步加强，如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为，作为文化传播和跨文化对话、学习、讨论与培训的场所，博物馆在教育（正式、非正式、终身学习）、社会凝聚力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0]。研究进一步指出，博物馆是有情怀的、亲和的公共文化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无原则地泛娱乐化，事实上博物馆承担着引导和培育高尚社会风尚的社会责任^[11]。这进一步明晰了博物馆办馆的价值取向。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应当形成独特的角色意识，应当“让文物活起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在遵循原有的宏大叙事、主流价值

观的同时，关注特殊群体、地域文化、环境气候、工业遗存以及社区建设，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多元诉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互动关系。因此，治理视域下的成人教育如何创新发展正成为博物馆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二）政策支持

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不仅需要理论指引，而且需要相应的政策扶持。相关政策的出台是一个渐进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政策与实践的积极互动作用。从国际政策环境看，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角色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Museums and Collection, Their Diversity and Their Role in Society, 以下简称“《建议书》”)，指明了博物馆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居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12]。《建议书》强调了博物馆应承担的社会角色，提出博物馆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的议题，特别是博物馆如何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对各国博物馆助力社会治理政策架构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比如美国博物馆联盟(AAM)未来博物馆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 CFM)的报告《博物馆和社会 2034：未来发展趋势》(Museums & Society 2034:Trends and Potential Futures)中提出了博物馆助力社会治理的实践方式：博物馆依托其藏品、项目和社区拓展活动，将成为重塑公民参与模式的领导者^[13]。这表明引导公众参与是博物馆助力社会治理政策制定需要考虑的重要方向。近五十年来，同属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博物馆法规和政策，这既是本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使然，也是博物馆领域推动的结果^[14]。关于这些政策的出台，博物馆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保障博物馆持续吸引政府投入、增强办馆活力、促进公众参与、提升成人教育服务能力均有积极意义。

当代中国博物馆一直在着手进行政策重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的需求，同时还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作了概念重建^[15]。《博物馆条例》(国务院令第659号)的出台对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第三十四条规定：“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特点、条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在管理体制创新方面，博物馆逐渐由行政管理下的馆长负责制向理事会治理下的馆长负责制转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16]理事会制度的实施使博物馆的管理运营更加透明化，也意味着有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可以参与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从而为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政策建构、理念创新建言献策。

（三）实践探索

“教育办馆”是博物馆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办在社区，提供就近服务，在辅助社区学校教育和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变革也是博物馆落实“教育办馆”理念的积极转型。“教育办馆”理念指导下的成人教育必然注重教与学的双向互动、教学相长，而不是单向知识传授。例如美国普拉特博物馆(Prate Museum)在“被弄脏的水：漏油事件”展(Darkened Waters:Profile of an Oil Spill)中，关于“生物补救”的标签在评估中发现不太成功，结果被一位参与评估的观众成功地修改^[17]。这一事件极大改变了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工作的传统思路，即通过关注现实问题引导成人积极参与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价值的预设。纵观近三十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即博物馆越来越从“功能视角”转向“价值视角”，或者说从“方法论导向”全面转向“目标导向”，比如1997年和1998年的主题都是“与文物的非法贩运和交易行为作斗争”(The Fight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f Cultural Property),2000年的主题是“致力于社会和平与和睦的博物馆”(Museums for Peace and Harmony in Society),2008年的主题是“博物馆：促进社会变化的力量”(Museums as Agents of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等^[18]。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引导之下，各国博物馆积极聚焦当下人们生活的社区、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激发公众参与的力量，推动博物馆与公众一道参与社会变革，构建集体记忆，促进了社会公平与社会认同。

中国近代的有识之士将博物馆从西方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壤，一开始就突出了博物馆的社会使命，将办博物馆与开发民智、救亡图存联系起来^[19]。比如1905年张謇首创南通博物苑，其创设的目的是“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此，博

物馆在中国发展伊始既负有普及知识、启迪民智的时代重任，又体现出助力社会治理的实践功用。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积极将业务与“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相关联，通过展览、活动、讲座、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已经将关注社会治理问题作为重点议题，为成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当前，我国博物馆成人教育逐步从注重服务形式的丰富转向注重教育内涵的提升，并且关注知识传授和价值表达的统一，这种实践表达了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的积极意愿。

三、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的挑战

上述进展并不能使我们回避存在的挑战和问题，研究认为，博物馆目前存在重建筑、轻展览，重建设、轻经营，展品研究、学术研究薄弱，展陈千馆一面，教育活动趋同，专业人才匮乏，馆员收入低、积极性差，缺乏内部、外部专业评估等问题^[20]。从研究者、政府部门、博物馆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辩证地看待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以问题为导向，为相关推进策略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理论研究还不深入

目前，治理理论对博物馆学界来说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学界较少从该理论的内涵、特征、体制、机制、方法、路径等方面作系统梳理。学术研究薄弱容易造成成人教育工作思路不清晰，较少对相关教育项目进行价值挖掘和理念提升，进而导致展陈千馆一面，活动流于形式；由于项目实施往往无法直击现实问题、突显教化功能，导致教育效果不明显。因此，博物馆如何有效发挥成人教育的作用还需要加强系统研究。

（二）政策建构还不完善

我国博物馆面临的实践挑战归根结底是现有的管理体制不具有社会代表性，且只能保证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服务，难以激发博物馆使用资源的积极性^[21]。比如专业人才匮乏、馆员编制少、收入低、考核没有发挥导向作用，导致没有对成人教育这一教育类型作出制度性安排，成人教育的教学团队、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一整套制度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缺乏系统性政策建构，不仅不利于博物馆自身的转型发展，也会影响成人对博物馆关注的热情。

（三）内涵提炼还不到位

目前，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过于关注实施路径的丰富，而缺乏教育内涵的提炼。当前，博物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多为开发周边文创产品、增加公众互动、拓展营销手段、完善信息技术等^[22]。虽然实施的路径多、方式丰富多彩，但是由于学术研究薄弱、专业人才匮乏，项目选择没有与治理理念有机结合，项目设计不重视知识内涵的提炼和价值导向作用的发挥，所以不能引发成人受众对民生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四）理念宣传还不充分

对于成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通过组织或社区被动参与社会治理。由于成人不了解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对博物馆的认识停留于获取文物知识的探秘场所，甚至仅仅当作逛一逛的休闲场所；加之有的博物馆并没有“走出去”展示自己的动力，工作人员也没有实施相应教育项目的能力，导致成人的实际受益面非常小。这种内外因素的局限性难以催生成人通过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达成参与治理的某种诉求。

四、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的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当代治理语境下多方协同、共同推

动的系统性工程。为逐步克服上述因素的制约，博物馆仍然需要坚持先进思想性和鲜明时代性的原则，从理念、政策和实践三个层面持续发力，通过加强政策引领、队伍建设、项目开发和实施方式创新，因地制宜形成系统性的推进策略，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治理效能。

（一）政策引领：坚持开放理念，完善参与机制

博物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方面，坚持博物馆内部管理的开放性。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指导落实博物馆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方式改革，为博物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坚持博物馆服务功能的开放性。通过完善成人教育的人、财、物保障政策，进一步引导博物馆加强成人教育的队伍建设与内涵建设，立足传统、面向未来，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为自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加强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政策制定的内外环境研究，进一步厘清博物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推动成人教育工作在理念、目标、队伍、内容、方法、路径等方面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对接。

2018年，时任广东省博物馆馆长的魏峻在“第二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上指出，博物馆应具有开放的资源、开放的服务、开放的心态，认为打造具有开放包容、智慧通达和共建共享特征的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23]。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不仅要进一步深化共建共享理念，还要完善成人参与机制。通过参与机制建设，一方面，加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社会治理知识的专项培训，形成引导成人有序参与治理议题的学习和实践行动的服务团队；另一方面，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开放理念、鼓励公众参与需要政策扶持，只有加大政府投入以及获取更多的社会关照和资助，才能更有利于博物馆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提供更多更好的、切合社会需求的教育服务，才能达成助力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

（二）场域拓展：统筹社会资源，扩大合作范围

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博物馆的运营理念转型是博物馆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的良好开端。在博物馆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中，多元性仰赖于场域的拓展而得到了进一步扩充。目前“馆社”合作模式的优势已初见端倪，如何加强与社区及社区教育机构的合作，创新“馆社”合作模式尚需进一步探索。北京史家胡同以博物馆为依托，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如2015—2018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朝阳门分会场的“为人民设计”系列活动、“回家串门”展览、“京城回眸——东四地区老照片”展览、“口述史”工作坊、“微花园景观社造”论坛以及与社区居民制订“东东南公约”等，使得博物馆真正发挥了“文化展示厅、社区议事厅、社区居民会客厅”的作用^[24]。博物馆成人教育的内容和活动辐射到社区建设领域，聚焦院落公共环境改造、交通、儿童出行、人居环境等民生问题，吸引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话题和付诸行动，这种“馆社”合作模式拓展了成人教育助力社区治理的应用场域。

场域拓展的实质还是开放理念的延伸，覆盖社区范围较大的大中型博物馆也可以俯下身来立足区域文化，关注公众诉求，策划更贴近社区居民生活的教育项目。江苏常州博物馆与常州开放大学牵头，依托社区教育网络体系，推动“馆社”合作模式，联合举办“书斋里的妙趣”“追溯，龙城的故事”“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巡展”等送教（展览和教育活动）进社区活动，并推出了三款“国宝守护者”H5游戏，博物馆通过社区教育的参与，拓展了服务空间，挖掘了教化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活动背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常州博物馆在与常州开放大学、社区的三方协同合作过程中，还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互动，并根据社区居民建议及时调整活动内容。为了满足社区里不方便到博物馆现场参观的老人也能享受博物馆高质量文化服务的需求，常州博物馆借助互联网将“江户的风景——日本浮世绘特展”策展人及讲解员直播导览送进养老公寓，通过集中观看、开展互动小游戏，帮助老人实现“境外大展云端览，足不出户线上观”的愿望。这里充分体现了居民不单纯是接受博物馆服务的“观众”，更是社会文化治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从而逐渐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促进文化权利均等化的实现。

博物馆，特别是地方性博物馆，要主动服务社区文化生活、引领社区文化治理。博物馆主动与社区教育机构对接，借助社区教育的网络体系开拓成人教育服务的场域，可以较好地提升服务效率，实现合作共赢的理念。

（三）项目设计：引导热点话题，拓宽参与领域

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需要具体项目落地实施，特别是在项目选择上应重点关注治理议题。例如，2016年常州博物馆举办了“基因：血统与人类家族”当代艺术展，展示了两项美洲原住民的帐篷、由上百张非洲裔美国人的照片拼接而成的“奴隶之船”以及雕塑和数码合成的图片作品，把美洲原住民、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历史融合起来。展览策划之初就考虑到如何加深成人观众对种族历史和文化的理解，运用“阐释+启发+参与”的模式，在活动中融入治理理念，加深公众对种族问题的认知。展览开幕时，博物馆邀请策展人托妮·斯科特（Toni Scott）驻场两天并为观众作深度解读，使观众对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展览期间，邀请翠竹中学外教、常州博物馆志愿者欧凯莉·康奈尔（Carly O’Connell）、劳伦·林其（Lauren Lynch）参与布展、翻译和展览阐释等工作，并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两期“不同文化，共同明天”主题文化沙龙。活动引导成人观众分别从方言、文化传统、旅居经历等方面讲述自己的身份故事，促进参与者构建多样性的价值认同，以及对他人文化与事物的尊重、理解及包容。又如，2019年上海科技馆举办的“塑料纪：信天翁的挽歌”艺术暨科普展，也巧妙融入“共同参与”的治理理念。展览中大型装置艺术作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震撼人心，整件作品使用大量废旧塑料制品制作而成，这些塑料来自于“净滩行动”的志愿者在上海周边海滩捡拾的海洋垃圾。公众作为志愿者参与展览创作，更容易让人们反观自身，进而引发关于减少使用塑料制品、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思考。再如，2016年正值“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发生350周年，英国伦敦博物馆（Museum of London）推出大展“火！火！”（Fire!Fire!），展示了1666年伦敦大火对城市的破坏以及人们如何控制大火、重建城市的历史，展览聚焦火灾这一公共议题，警示人们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做好火灾防范工作。

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的视野应当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积极关注时代发展的热点话题。。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武汉革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多所博物馆迅速行动起来，收集疫情防控的物证资料，展示人们在应对疾病灾难时的史实和见证物，提振市民众志成城、应对危机的决心。当下，我国正处在多种文化形态交织并行的时期，加之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日趋老龄化等社会现实，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文化分歧与隔阂的可能性加大。这就需要博物馆变得更加“接地气”、更加有温度，通过陈列展览、社会教育项目、社区介入活动等，帮助不同文化人群弥合隔阂、和睦相处，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独特的文化贡献^[25]。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承担着引导社会正能量的责任，因此，每个教育项目不仅仅是单向知识传授，更应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通过教育引导，帮助人们提升道德情操和公共责任意识。

（四）方式创新：组建学习团队，丰富参与方式

成人通过社会组织或学习团队参与博物馆的教育项目，可以进一步发挥组织或团队的成员召集、议题选择、互助学习、自我管理的作用。成人群体具有年龄层次的复杂性、职业种类的丰富性、受教育状况的差异性、社会身份的多样性等特点。针对上述特点，博物馆需要进一步推动成人教育的组织方式创新，比如采用搭建平台的方式，汇聚各类组织、协会、学会，围绕某一专业领域或民生话题，组建丰富多彩的学习团队。仍以常州博物馆为例，馆内设有江苏省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常州博物馆理事会、常州市博物馆学会、常州市收藏家协会、谢稚柳研究会、博物馆之友、志愿者团队等组织以及诸多的草根学习团队，共同推动成人共学促学方式的变革。

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应积极围绕治理议题，开发更多的教育项目，加大成人学习的服务供给面。在收藏方面，博物馆可以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以治理议题为主，广泛依靠社会的捐赠，增加博物馆的收藏；在研究方面，引导公众参与地方史研究，如发动社团组织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史等；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各种学习团队的作用，为博物馆教育项目“走出去”出谋划策；在展览与项目策划方面，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实现共建共享。如广东省博物馆2016年推出“社会策展人招募计划”、2017年实施“微展览”项目，通过公开招募展览策展人的方式，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与销售。通过组建学习团队、创新参与方式，可以更好地推动成人依托博物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提升成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综上所述,加强基于博物馆的成人教育助力社会治理的研究,有利于创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建构;有利于加强队伍建设和内涵建设,加快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有利于发挥博物馆的教化作用,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治理效能,更好地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参考文献:

[1]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

[2]a. 欧盟资助的“成人教育与博物馆计划”包括高级人员退休早期计划、失业人员再就业计划、残疾人计划、博物馆的语言学习、青年人的职业培训、学徒资格课程、犯人课程,参见石瑞:《浅谈博物馆与成人教育》,《软件》2014年第9期; b.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设立“V&A学院”,推出一百多种成年人课程,并按季度更新,参见邱慧蕾:《为公众打造终身学习的“博物馆学校”——英国博物馆成年观众教育活动的实践与启迪》,《中国博物馆》2018年第3期。

[3]杨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究——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4]陈成文、赵杏梓:《社会治理: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及其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

[5]严建强:《从秘藏到共享:致力于构建平等关系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2期。

[6][英]托尼·本尼特著,王杰、强东红等译:《文化、治理与社会》,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499页。

[7]周海玲、张志强:《文化政治美学视野下的治理理论研究——从福柯的政治治理到托尼·本尼特的文化治理》,《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8]张俊龙:《〈以观众为中心:博物馆的新实践〉——来自欧美博物馆界的前沿经验》,《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9年第1期。

[9]孔达:《从英美经验看博物馆与社会包容》,《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2期。

[10]张红艳:《“守正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博物馆”研讨会综述》,《文博学刊》2020年第1期。

[11]安来顺、毛颖:《国际化、高质量、可持续: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副主席安来顺先生专访》,《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

[12]李慧君:《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作用的建议书〉》,《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年第2期。

[13][美]克里斯蒂·范·霍芬、洛尼·韦尔曼著,庄智译:《招募与管理志愿者——博物馆志愿者管理手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4]安来顺:《中日韩博物馆政策环境与博物馆发展的初步检视》,《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

[15]索菲娅·保洛著、张羽译:《中国公立博物馆的政策及影响:新趋势和挑战之探究》,《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19年第1-2期。

-
- [16]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求是》2013年第12期。
- [17]严建强：《从秘藏到共享：致力于构建平等关系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2期。
- [18]段勇：《再谈博物馆的多元与包容特质》，《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2期。
- [19]苏东海：《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4期。
- [20]周婧景：《博物馆治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3期。
- [21]同[19]。
- [22]和梦莉：《博物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路径研究——以故宫博物院为例》，《轻工科技》2020年第3期。
- [23]魏峻：《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新导向》，《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
- [24]吴春花：《老树发新枝：东四南历史街区的创新治理与更新——访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建筑技艺》2019年第11期。
- [25]同[11]。